

“惘惘的威胁”

——时间焦虑与张爱玲的创作

何清

【提要】张爱玲是一位被众多读者喜爱,也被学术界广泛研究的作家。关注和针对某一作家的具象研究,是文学史和艺术批评必有的一种方式。而当我们扩展眼界,从艺术对人生的要义之视角,对创作和创作成果——作品的欣赏过程进行更深入的关注时,发现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值得我们探讨。笔者在把握创作心理原动力的理论基础上,从张爱玲创作中体现出的时间焦虑切入,分析和探讨这种人类普遍存在的焦虑感,经由张爱玲个性的体验,是如何传达和表述的,用以达到对文学、对艺术品于人类精神世界意义的更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时间焦虑 张爱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 (2010) 04—0112—07

但凡熟悉张爱玲的作品,总会记得她那句口头禅:“来不及了”,时间焦虑在张爱玲的创作中表现为一种泛化性的表述,这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或者,抓住此点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是理解张爱玲作为创作主体的心理动力以及更深入地解读她作品的一个关键;同时,这也是更深入理解艺术品于人生意义的一个切入口。

一、时间焦虑与艺术活动的关系

1. 时间焦虑

焦虑(Anxiety)是现代精神分析重要的基本概念之一,指由于内在或外在原因而产生的一种恐惧、担心或精神痛苦。弗洛伊德区分过三种不同的焦虑,即:现实性焦虑;神经症焦虑;道德性焦虑。^①当代心理学对之不断有更精

深的研究和认识。总的说来,人,是具有时间意识和死亡焦虑意识的,这也许是人与其他动物、植物的一个本质的区别。个体生命不论拥有如何强健的体魄与旺盛的生命力,不论是什么肤色与人种,不管贫穷还是富有,不论是医疗水平的高低、科技的发达与否,终归都免除不掉会终止生命,重归于无机物质的铁定命运。由生命有限引发的焦虑,是人类个体最深层的痛苦和困境。

“就人类个体而言,时间意识是伴随着自我意识的出现而出现的。没有自我意识的婴儿是没有时间意识的,消除了自我意识的神秘主义

^① 冯川:《文学与心理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页。

者也同样没有时间意识的……”^①而众所周知，个体生命是一次性的，时间是不可逆的。那么，这样看来，对时间的焦虑，可以等同于生命意识的关注与焦虑。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思维与自我意识的越来越清晰和成熟，人们加倍感受到了生的可贵与短暂，生命的无常与无奈。

这种焦虑在一些自我意识比较强的思想者、艺术家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因此，前有孔子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屈原在其《离骚》中也感叹：“老冉冉其将至兮，空修名之不立”；“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后有唐代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直接吟唱出了其建功立业的雄心和生命时间的短促相矛盾引发的深层痛苦，这种痛苦的情绪由于是人类个体生命时光局限所致，因此，它必将是超越时空，被所有感受到了这种痛苦的人们所接受的。

2. 解脱之路

为了解脱这种困境带来的恐惧与焦虑，人类的先哲、智者们都给我们指出过一些方式。比如中国儒家是用道德精神的不朽来超越死亡困境，解除人对时间的焦虑的。在儒家看来，人的肉体生命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而人的道德精神的存在却是久远的。所以，为了崇高道德价值的实现，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而道家则看法不同，他们认为人的生死都是自然运化的规律，无所谓生也就无所谓死。人只要在精神上与大道合为一体，就无所畏惧，正如庄子《齐物论》所讲的：“齐彼此、齐是非、齐物我、齐生死”。此外，佛教讲“轮回”，基督教讲灵魂，最后要看各人在世间的修行而到达“天堂”或者下到“地狱”等等。各种宗教教义也许差异甚远，但核心无疑就是为世人提出一个可以解脱生死、解脱时间焦虑的方式。

学者冯川在研究了人的死亡恐惧（含时间焦虑）与创作冲动之后，罗列了几种人类在对待这个焦虑时候的处理方式：人类使用过“逝

者不逝”和“永恒回归”的神话去消除时间（生与死）的焦虑，也使用过“想象去杀死时间”等等其他方式。最后他说就算是“漠然”和“泰然”仍然不过是人类企图摆脱焦虑的不成功之方式。^②

3. 文学的传达

艺术本身就是一种重体验、重情感的人类精神活动。对这种由于人类个体生命局限所带来的时间焦虑的体验，艺术家们非常敏感。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传达艺术家个人的，也包含人类共同的时间焦虑情绪。

被普遍关注到的我国魏晋时代，源于对人的个体生命的短促的关注与重视而引发的时间易逝、人生易老的慨叹，^③达到了一个高潮。艺术品的创作与艺术理论，在那个时代也相对繁荣。鲁迅先生所言“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④之所以有这样的论断，正是由于此时的艺术（尤其是文学中诗歌一类作品）所体现出的人的生命意识的逐渐成熟，并由此所带来的时间焦虑，体现的也正是人对自身存在价值与意义的思考。

那个时期的艺术活动被李泽厚先生称为“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和空间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⑤翻开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类似关于时间与生命短促的吟唱，比比皆是，如《古诗十九首》所吟：

“去者日以疏，生者日已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间，欲归道无因。”再有“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除此之外，

①② 冯川：《死亡恐惧与创作冲动》，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178页。

③④ 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的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526页。

⑤ 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还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由于汉末社会动荡不安，关于人命危浅的苦闷叹惜，在诗中有充分的表述。对毫无出路的下层草根来说，除了哀叹别无他路，而就算是曹氏父子这样地位显赫，政治权力、军事势力不可一世之人，在他们的作品中，亦是反复书写着对人生短促的慨叹。曹丕《短歌行》说：“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一何早。”曹操《短歌行》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样一些感叹，无一不指向人生的短暂，生命的无奈，是一种让人挥之不去的关于生命与时间的焦虑。

当代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曾提出过“诗意栖居”的概念，他借用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充满劳绩，但仍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以说明“诗不只是此在的一种附带装饰，不只是一种短时的热情甚或一种激情和消遣。”^①提出这个被广为流传的观念是想说明，人类无论有多少成绩，世界也是有限的，而人类要解脱焦虑，靠泰然、漠然甚至宗教的方式，都是行不通的，“诗意的栖居”就可以帮助人类冲出这有限的世界，达到无限。“在海德格尔那里，文学的诗不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人生，是一种存在方式。诗不仅是诗人的而是人类的。你可以不是一个诗人，但你却不能不是一个诗意的存在者。”^②按照文本的理解，这里当然不仅仅是指诗歌这样一种文学样式，它甚至包括各种品类的艺术活动。人类经由艺术活动，使有限的生命，扩展开广度，延伸开长度，就是一种对人类个体生命与时间有限性带来的焦虑的疏导、发泄、抵抗甚至是消除的方式。

所以，当我们回到文章讨论的副题，像张爱玲一样用文字书写她关于世界的感受、关于她感受到的时间焦虑，就是许多艺术家（当然个体有差异）用写作抵御恐惧、缓解焦虑的方式。写作甚至是他们的一种存在方式，是活下去的理由和支撑。所以，在外人看来那样辛苦地写作，在他们却是乐此不疲、欲罢不

能的。因此，用艺术的书写来缓解和抵御时间焦虑，可以说是人类从事艺术创造的一种心理原动力。

二、张爱玲作品中时间表述分析

1. 紧迫性

回到对张爱玲作品的具体审视，我们发现，她的口头禅“来不及了”频繁出现在作品中，尤其是散文中。

“我得了教训——老教训，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③

在《传奇再版序》里面，张爱玲还有这样一段直白的述说：“出名要趁早呀，来的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④

看到这些“来不及”类似的话语，一种人类关于时间的焦虑感，立即涌上每个读者心头。也有评论者认为张爱玲的这种对时间的紧迫性，要现时的成名，而且很享受这种“出名”的快乐，类乎于一种“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但是，如前文所述，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而引发的时间焦虑并不是某个作家、某个个人所独有的。因此，我们与其批评她的“及时行乐”，不如在共情的基础上去理解她。

在《童言无忌》中，她说回忆见到母亲在穿着漂亮的服饰时：“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我说过：‘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越是

① [德]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19页。

② 傅道彬、于菲：《文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③ 张爱玲：《烬余录》，《张爱玲全集》第1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④ 张爱玲：《传奇再版序》，《张爱玲全集》第1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

性急，^①越觉得日子太长。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缓，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②

后来稍长大，她使用一张漫画投稿收到的五块钱稿费，这是她生平第一次赚钱，便是“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

中学毕业后，她本来是打算直接到英国去留学读书的，战争的爆发让她痛失机会，只好到香港就读于港大。这场战争带给作家的心灵刺激，最为集中地体现在生命、时间的感受上。在《我看苏青》一文中写到她自己早有计划，所有辛苦努力就盼着还能够曲折地通过香港，毕业后再到英国去求学。然而，现实的“文的节拍”呢？却始终让她不能够遂心所欲。即使是每样功课都考第一，所有的努力也都毁于一旦：“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掉了，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而当时总是被逼迫着，心里很不情愿的，认为是糟蹋时间。我一个人坐着，守着蜡烛，想到从前，想到现在，近两年来孜孜忙着的，是不是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我应当有数。”^③

当现实事件严重打乱人们的生活常态，人的心灵遭受的关于生命与时间的焦虑，肯定是更为强烈和具体的。作为艺术家的张爱玲，由于其自身情感的敏感性、丰富性，便将由于现实性引发的时间焦虑，弥漫成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无奈意识，十分痛苦，十分紧迫：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着一惘惘的威胁。”^④

飞机炸弹成天在头顶飞舞的残酷战争，使身边的许多无辜的生命在枪炮中陨落。所以，她没有理由不喊出：“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而这种“惘惘的威胁”便成为张爱玲毕生挥之不去的一种烦恼、压力，也成为她创作的心理动因，在她整个创作中都持续不断地表述过。

2. 荒诞性

战争用一种极端的人类自杀与他杀的方式，

更加快了自己生命结束的步伐，时间的紧迫感骤然加剧，用什么来抵御眼看已经快崩溃了的人的精神世界呢？张爱玲写到：“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⑤在《烬余录》里面，她讲述那个时期报上的征婚广告空前繁多，一对结婚的新人，到他们办公室想向防空处长借汽车去领结婚证，“他们来了几次，一等等上几个钟头，默默对坐，对看，熬不住满脸的微笑，招得我们全笑了。实在应当谢谢他们给带来无端的快乐。”^⑥类似结婚，学生之间的调情、同居也相当的普遍和公开化，“战争小孩”（战争期间的私生子）骤然增加。

除了结婚，用多一个人和自己一起共同抵御生命的无常的感觉之外，还有就是吃。张爱玲写她们在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地找寻冰淇淋和吃食：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

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本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了下流的，反常的。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楚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慢。许久

① 傅道彬、于菲：《文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② 张爱玲：《童言无忌》，《张爱玲全集》第1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③ 张爱玲：《我看苏青》，《张爱玲全集》第1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④ 张爱玲：《传奇再版序》，《张爱玲全集》第1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

⑤⑥ 张爱玲：《烬余录》，《张爱玲全集》第1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129页。

许久，街上的吃食仍旧为小黄饼所垄断。渐渐有试验性质的甜面包，三角饼，形迹可疑的椰子蛋糕。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

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①

张爱玲为此质疑到：“……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女子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②个体生命本来无法抗拒时间的流逝和最后的终结，战争更加剧了人们对死亡和时间的恐惧，表现为一种强烈的焦虑，拼命想找到救命稻草捞自己出苦海。小说《倾城之恋》中白流苏遇到的浪荡公子范柳原，就他的本意毫无与流苏结婚的想法，然而“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命运的吊诡，是有限的，人花再多的时间也捋不清个中逻辑的，只有那“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③

3. 存在性

熟悉张爱玲的读者，都不会忘记她有一篇《天才梦》的散文。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这些缺点包括不会削苹果、不会补袜子、怕上理发店和裁缝店、不会织毛衣，不会用肥皂粉洗衣服……等等，生活的自理和待人接物方面，是一个极其低能的人。但是：“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 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④

从她人格个性和后天教养所滋生出来的对人生审美体验的敏锐以及文字驾驭能力，写作，既已是她自立生存，也是为了克服生命那“一

袭华丽的袍”上的“爬满了蚤子”、“咬啮性的小烦恼”，以期达到“诗意的栖居”的方式。

蚤子的成虫和幼虫终生在寄主体上吸血，令人厌恶和烦恼。不难理解血就是人情感和生命的象征，失血就是失去生命的同义。那些一直纠缠不休嗜人血的虱子带来的烦恼，就等同于生命必然遭受的困境一样。不论人做何努力，却永远也无法摆脱命运，让人焦虑也让人无可奈何。

张爱玲幼年遭遇父母失和，家庭离散。母亲为了实现自己作为女性的独立意识，而无意也无奈地伤害到了年幼的她（张爱玲母亲第一次出国的时候，她才大约4岁）。孤独内向的性格，先天的艺术资质，促成了她对人性、人生的敏锐感觉。9岁尝试给报馆投稿，10岁就写小说。从事写作，既是她生存于世俗的手段也是生存于世的价值，写作带给她的意义恐怕就应该推及到抵御焦虑和超越生物性活着的一种人的存在的需要。

“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其童年时代，都可能因为自己的幼小软弱、无能为力而蒙受某些外来的恐惧，有过某些创伤性应验。在尔后的生活中，任何对未来危险的预见，都可能因接触到这些创伤性经验而引发恐惧和焦虑。”^⑤所以，在她的创作中，我们不乏见到她总是感觉被一种声音催促着，要想做什么就立即去做，否则有“来不及”的后果。

而“想做什么，立刻去做”，我们知道，这就是典型的处理焦虑的办法。由于她少年时代所受到的文学熏陶和良好的驾驭文字的能力，写作于是就成了张爱玲内心焦虑的一个出口。^⑥

张爱玲的创作也正好说明了现当代文艺心理学的研究观点：“哀伤需要出路，而创造力可

①② 张爱玲：《烬余录》，《张爱玲全集》第1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129页。

③ 张爱玲：《倾城之恋》，《张爱玲全集》第3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第88页。

④⑥ 张爱玲：《天才梦》，《张爱玲全集》第1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136页。

⑤ 冯川：《文学与心理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页。

以提供一个出路。”^①

4. 重复性

张爱玲在处理焦虑的那种“立刻去做”的举动，到后来从事写作和写作中的表述，还体现出了一种不断反复的行为，并且这种反复书写的过程中，由于焦虑带来的痛苦并未减退，仍然是长相伴随，可以看出其行为所带的强迫性症状。从几岁时候的“简直等不及长大”、少年时代得了稿费就“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再到文章中的“快！快！来不及了！”我们可以关注她这种行为的一贯性的特质。在《我看苏青》一文的结尾，她写到：

“她走了之后……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

这种“身世之感”可以用来作为她的创作中时间如何被表述得那样紧迫焦虑的注释，那就是不断被焦虑压迫又不断用文字书写的反复过程。写《我看苏青》文章的时候，她才25岁，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生命本该犹如春天一般，是有希望、有能力、有资格向外发射生命力的年岁。所以，我们认为张爱玲的时间焦虑的感受，和年龄与岁月并无必然的关系，这是她个性中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作为创作主体的她，必然在一系列作品中不断重复。

早在1933年她13岁时就用下面的文字，写出了她对生命时间的焦虑之感：“咳！苍苍者天，既已给与人们生命，赋与人们创造社会的青红，怎么又吝啬地只给我们仅仅十余年最可贵的稍纵即逝的创造时代呢？……像人类呢，青春如流水一般的长逝之后，数十载风雨绵绵的灰色生活又将怎样度过？”（《迟暮》）24岁时由于遭受战争这种非常态的生活经历的创伤，让张爱玲的文字中关于人生无常，时间非常紧迫之感更加扩大，成为一种无法抗拒的压力：“冬天的树，凄迷稀薄像淡黄的云；自来水管子里流出来的清水，电灯光，街头的热闹，这些又是我们的了。第一，时间又是我们的了——

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烬余录》）在炮火下看小时候读过的《官场现形记》，她“一面看，一面担心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字印得极小，光线又不充足，但是，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烬余录》）

在她创作生命由旺盛到留居美国期间越来越衰退孤独的跌落里，对时间的焦虑逐步在升级，最后演化为一种直接明显的死亡恐惧。生命那一袭华美的袍子上“咬啮性的小烦恼”——虱子，成为越来越强大的压力，直到她无法抗拒。她四处搬家，躲避记者和有兴趣打探她消息的人，选择住处其中重要的一点要求就是“没有虫子”。从1984年到1988年三年多的时间里，她的家搬来搬去，甚至一个星期就要搬家一次。据说是因为虱子引起的皮肤瘙痒症的折磨。

在这里，如果不从心理学的角度，我们就无法去理解张爱玲的这种怪异行为。很明显的死亡的意象，对死亡的恐惧，表现在她作品中泛化性的不间断重复表述，而到了她写作活动受阻，也就是焦虑的出口受堵甚至封闭的情况下，无法抗拒的这种时间焦虑和死亡恐惧，就直接压垮了她的生命。正如她自己所言：“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②

当自我失去自身存在意义的体验感时，压抑的死亡恐惧就会出现在意识层面，给人带来莫名的不安，这就是焦虑的根源。而体验自身的生命价值，正是获得存在感的重要途径，人们总是需要以某种方式来体验自己的生命力量和价值。写作正是人自身存在感的一种体现，是张爱玲最擅长和最愿意用来抵抗和消退焦虑的办法。虽然最后她还是被人类共有的命运带走了生命，但书写无疑正是她被自身命运挑选的一种存在方式，一种活着的过程，她留给我们读者的众多作品，也正是她在世上“活过”

^① 平路：《伤逝的周期——张爱玲作品与经验的母女关系》，《阅读张爱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

^② 张爱玲：《更衣记》，《张爱玲全集》第1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的一种明证。这也正如普希金的一首诗歌里为自己也为艺术歌唱的：“我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上，青草不再生长。它抬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高耸在亚历山大的纪念石柱之上。不，我不会完全死亡——我的灵魂在神界的诗歌中，将比我的灰烬活的更久长，和逃避了腐朽与死亡。”^①

本文作者：四川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马光

① 普希金：《纪念碑》，华宇清编撰《外国历代著名短诗欣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6~407页。

“Desolate Threat”

——Time Anxiety and the Creation of Eileen Chang

He Qing

Abstract: Eileen Chang has been a favorite writer of many readers, also extensively studi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Attention and response to the specific study of a writer is an indispensable way for literary history and art criticism. When we extend the eyes, more concern with the essence of art to life, creativity and creative works—in-depth appreciation of the work, there are still many interesting points worth our exploring.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creation of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 and time anxiety in Eileen Chang's creation, through Eileen Chang's personal experience,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discusses how this widespread anxiety is conveyed and expressed. Such discussions may lead to a more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literature, art, the meaning of art for human's spiritual world.

Key words: time anxiety; Eileen Chang

观点选萃

教育文化学视域下的西藏宗教教育

赵亚伟 贺艳军

西藏大学硕士研究生赵亚伟、贺艳军认为：教育文化是人们对教育活动的过程、方式、内容和结果的情感与态度。从教育文化学的角度研究西藏早期的苯教教育、吐蕃时期的寺院教育和元、明以来藏传佛教诸教派教育的特点及教育内容等，有助于客观、科学地评价宗教教育对西藏现代教育发展等的影响。

自20世纪以来，人类文化、科学和教育突飞猛进。借助文化哲学的力量，人类对教育与文化关系的思考和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教育文化学也在此基础上萌芽、发展。而从教育文化学的观点看，研究西藏宗教教育是研究西藏现代教育和文化传递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西藏的宗教教育相当发达，不仅历史久远，规模宏大，而且制度十分完备。特别值得寻味的是，自13世纪中叶以后，藏传佛教寺院不仅垄断了西藏的文化教育，而且还支配了整个西藏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其影响之大、时间之久、范围之广，在整个世界教育文化史上也不多见。

(马光 摘编)